



潮州文史資料

政协潮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组编



第 18 辑

潮州文史资料

第 18 辑

(内部资料)

政协潮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组编

1998.12.

主 编：曾楚楠

责 编：谢 苗

封面题字：秦 畧 生

封面设计：洪白虹

潮州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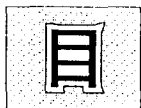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粤印准字第 1456 号

出版单位：政协广东省潮州市委员会
文教体文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1998 年 12 月

排版印刷：潮州市湘桥文星印刷厂



·峥嵘岁月·

三十五载人生曲

——一个文化人的自白（下）…………… 陈俊彝（1）

建国前后潮安县堤防纪事（1946——1957）…………… 张志尧（65）

·人物述林·

他把一生献给艺术

——记中国早期电影拓荒者陈铿然…………… 陈贤武（75）

雄文证历史 迅笔驱风雷

——记台湾《独家报导》周刊及其创办人沈野

先生…………… 曾圣任（85）

海外潮彦 侨社俊杰

——泰华事业家、慈善家余子亮纪事…………… 郑仁章（92）

王龙才及其陶艺精品…………… 石遇瑞（96）

·文化史谭·

故土掇瑑（三） 叶天津（102）

木鱼清磬出新声

——漫谈潮州寺堂音乐 蔡景亮 杨英伟（107）

·往事寻踪·

一九四五年以前日本人在潮汕地区史略 房建昌（111）

1860—1866年潮州人拒绝洋鬼子入城事件 王 槐（151）

潮城小贩素描 许振声（157）

潮城刻印业琐记 石遇瑞（177）

也谈潮州十三组之发端及更鼓节奏 宋永丰 郑雪依（182）

·梨园掌故·

潮州梨园漫记（二） 刘管耀（187）

·侨林胜览·

浅谈泰国的潮州人 杨锡铭（214）

·文 摘·

台湾高中教科书全部开放民间编写（64）

越来越膨胀的政府机构（74）

历史上并无“清政府”（95）

三十五载人生曲

——一个文化人的自白(下)

陈俊彝

内容提要:

四、奈何重蹈旧辙

- ▲再入文化门
- ▲接待宾努亲王
- ▲在陈桥驻点
- ▲全县业余文艺会演
- ▲政治样板——田心大队

五、老队长的担子

- ▲“老队长”
- ▲二次海南之行
- ▲变革
- ▲万里长征
- ▲南澳岛慰军
- ▲会演办公室
- ▲为周总理设灵堂
- ▲尝不尽的苦涩

六、还是当了局长

- ▲“鹤巢帮”
- ▲农村文化中心与现场会
- ▲建国 30 周年会演
- ▲藕断丝连

▲文物普查

▲极左主义者的悲哀

▲兴办文化企业

▲文艺界的忧患

七、十年的文化官

▲领导班子的困惑

▲?!

▲并团撤班

▲蛇岛音乐节

▲举办个人影展

▲申报名城

▲韩祠，潮州人的骄傲

▲编写志书

▲难忘的1987年

▲电影十年

▲选拔干部

▲首次出访港澳

▲编辑地方文化丛书

▲为培训班上课

▲越南义安校友会

▲“三连冠”

▲“安慰奖”

▲一要干二要休

尾声

四、奈何重蹈旧辙

当我回干校时，王炳南、林继杰已先后调去二轻厂当厂长，因此我也期望离开文化线这个“是非之地”，也不顾在艺术上耗费的心血付之东流。

1971年年底，通知我到县革委会组织组（相当于组织部）报到。我听说要调人去大山、田东等山区当宣委没人愿去，于是，暗自打算，这也许是离开文化线的机会，因为这一定能得到批准。

“要调你去文化馆当副馆长。”组织组一位军代表对我说。

“我希望不再到文化线工作，听说大山、田东没人去，我愿

意去。”

“不行，这是文化线点名要人的，没有提名的要候以后统一分配。”

我很矛盾，如果坚持不去，就可能回干校等候以后分配，以后又能否离开呢？长期所形成的组织观念，又支配着我不应向组织讨价还价，毕竟在此之前尽管我的工作岗位变动不大，但每次我基本都愉快接受。因此，我决定先回文化线再说。

此后，我才知道是当时任文艺办公室（相当于文化局）副主任的田在珍提名的，他当时负责社会文化，需要我去协助。

就这样，无奈何好马也吃回头草！

再入文化门

如同文革期间其他机关单位一样，文艺办公室也是处于军管之下，主任是一位姓罗的教导员，人倒是比较老实，有政治干部的风度，人们习惯称为“罗教导”。副主任有三位：唐小军、陈立弘、田在珍，除田外，我都不熟悉。陈因为原来主管专业；曾在看小队演出时见过一次面，他大概也听过我的名字，因此见面很热情，此后我们也成为朋友。

唐小军算是部队家属（141医院院长的妻子），人还不错，罗走后她任正职（改为文化局），虽然本事并不是很大，但和大家相处关系较好，我也对她很尊重。

三位副职都是部队转业，也都在部队从事过文艺工作，看来在安排上还是注意到熟悉业务这一环。

我于是到文化馆当副馆长，正馆长王冬榴，也是一位部队家属，而且是高级军官的家属（军政治部主任的妻子），副馆长周维汉，也是转业兵，曾任工人文化宫主任；吴六是五十年代的农民诗人，土改后转为干部。除了他我比较熟悉外，其余二位都不认识。

对于这两个班子，我都无所谓，熟悉我的人相信对我有所了解，不熟悉的我相信可以共处，因为我毕竟也当过兵，对当兵的多少有所了解。

1972年元旦过后我去报到，就通知我到汕头去观摩会演，同行的还有老朋友施策。他比我先调来文化馆当辅导干部（撤销剧团后他“下放”至瓷厂当工人，我在干校时曾多次顺道去看望他们），我们可说是“难兄难弟”。

接待宾努亲王

当时参加全区文艺会演的主要是小队，她曾于1971年参加全省艺术会演，以18人演一台节目，被誉为“十八棵青松”。（《沙家浜》中养伤的新四军）；《汕头日报》也以《立足小土台，服务工农兵》为题予以评介。

小队除参加省会演的部分节目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潮州大锣鼓《山野新歌》（由杨汉荣作曲兼司鼓）。因为“文革”期间，大锣鼓也曾作为“四旧”扫荡而静寂，因此，《山野新歌》可以说是在全区首先敲响了大锣鼓。

会演期间，突然接通知，要参加接待柬埔寨首相宾努亲王演出，潮安参加的节目是大锣鼓和歌舞《凤凰山上采草药》。为此，唐小军拉我一起去购置服装和白手套。这时发生一个小插曲：唐要我破棉衣换掉，因为是接待外国客人期间，不大雅观。这个棉衣是我当兵的军棉衣，经多次洗涤，已变成白色，且多处缝补，但已伴随着我度过了漫长的日子，所谓“衫破正是衣”，因此我真不想脱掉。但那时仍然是“文革”，我只是在干校刚“上岸”，因此只能在公开场合脱下，此后我也一直是把它珍藏，不忍丢弃，这也许是一种“恋旧”心理在作怪。

由于中队要赴海南岛慰问，也到汕头来，随团的三个小演员没有演出任务，就交由我和施策带领。他们是“文革”期间举办

的一期“短命”艺训班的学生，其中郭克贵、刘燕君后来成为我的队员，在文宣队撤销后郭克贵到潮剧团学司鼓，以后又当了副团长；刘燕君则在剧团一段时间后转到机关工作，也当上了财政局的副科长。

我们没有其他任务（当时接待演出更不能参加），每天就带着他们三人去游街，也到蔡丽卿的家里去。她曾是文工团舞蹈队的队员，调去珠影后又转回汕头文工团，“文革”时她的丈夫被打为“反革命”。她与我、施策的关系都很好，曾多次到潮剧团来探望我，为此也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我并不避嫌，在她困难时去关心她、安慰她，我想这才是朋友之道。此后，他们夫妻都成为我的好朋友，不时有来往。其实，在我的眼里，她们都是“小妹妹”，只不过在文艺团体人们乐意传递桃色新闻罢了。

在陈桥驻点

也许我永远摆脱不了舞台艺术这一关系。

到文化馆上任后就观摩会演，回来后又到陈桥大队驻点，办业余文艺宣传队，同行的还是老搭档田在珍、施策等人。

陈桥是当时全县著名的先进大队，以“一年八熟”的间套种而享誉全省。业余文艺宣传是由本村部分男女青年和当时到顶湖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组成，我们为这支队伍组织训练和创作、排练了一台节目，包括唱当地的《间种套种就是好》、《陈桥妇女积肥忙》、《顶湖山上五愚公》等，成为以后参加全县、全区、全省业余会演的佼佼者。

陈桥尽管就在郊区，但作为驻点，我们仍然在那里设置一个“家”，基本是住下来，每天到大队食堂吃饭。那时县委也有工作组在那里常驻，而大队的集体经济也是全县屈指可数，因此办文宣队的经费问题不大，大队领导班子很支持，队员则主要靠记工分，根据不同的条件评底分。排练地点则在祠堂，也曾拉到顶湖

山。我们除组织他们排练外，有时也参加他们的集体劳动，关系算是比较密切，尤其是与主管的总支副书记周元勋（他后任枫溪影剧院副经理）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

全县业余文艺会演

全县的业余文艺会演每年都定在5月23日（即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的日子），我在万峰山水库时，曾带领水库宣传队参加过一次，但那时只是旁观者，现在却是组织者，负责会演办公室的演出组。

为了筹备会演，在完成了陈桥队一台节目的组织排练后，我们就离开。我和施策、耿东（阶级教育展览会的女讲解员）到各公社辅导和检查节目。

在一些公社，我们举办表演学习班，除形体的基本训练外，还要上课讲一些基本知识，这个任务就落在我身上。无可奈何不得不捡起当年那些“破烂货”，为学员讲解一些表演的基本知识，没想到却“骗”了一些人，他们以为我是行家，居然在排练辅导时称我为“先生”（旧戏班中集编导教于一身的最高艺术“职称”），殊不知我只是“半桶屎”，有时哭笑不得。

在此过程我结识了不少业余文宣队和一些入，而一直保持较密切关系的是古巷公社的古三文宣队，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正副书记既重视又热情，而且有一些较好的骨干，他们和施策的关系很密切，因而也成为当时较有影响的文宣队。此后我在县文宣队时，还曾带领一批作者去他们那里深入生活，写了一些小戏。他们与陈桥、田心成为当时文化的三个落脚点（生活点）。

会演期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那时会演后每次都要组织一台节目到军部演出。由于这是一种荣誉，各队都要争取，因此讨论确定节目往往是秘密的。

在会演临结束时，我和唐小军、田在珍在演出组讨论，声音

很小，但隔壁吵得很大声，于是田在珍用手拍了几下墙板，随后我也就说了声“静一下”。但适得其反，隔壁反而吵得更大声。我见唐、田都不再吭声，也就作罢，只好再靠近聚神商谈。

事后，我才知道隔壁是政工组，组长是人事干部陈木弟，他因听到我的声音，竟公然指名骂我，并故意再吵大声，显示他的“威风”。

关于此君，我后来才知道他是被派来“掺砂子”的，因此局长们也怕他三分，更何况我是“背黑锅”的人，更不放在眼里。他是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典型人物，后面我将专题叙述。

在军部演出时，古三文宣队演出歌舞《洗衣歌》，一位队员在台上扎着图钉，但她一直坚持至演出结束，由此可见当时演出的认真严肃程度，此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政治样榜——田心大队

“田心人，吟唱歌，会作田。”这是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的一句话。

磷溪公社的田心大队，作为武装部门的点，是当时全县“突出政治”的样榜。由于地处韩江堤边，土多沙质，产量不高，因此就出现以上这句话。其实不言而喻，那并非针对田心大队的群众的。

“9.19”林彪事件以后，中央下发了文件，并逐步传达到群众。

会演结束后，我又被派到田心大队，一方面配合武装部门工作组贯彻文件，一方面开展业余辅导。为了使群众易于理解，我组织郑树楠等一些美工人员，把中央文件的内容办成一个展览。对此，有人觉得是否违反了保密制度（因中央文件是机密的）。但我认为既然传达贯彻到群众，已无保密可言；而对田心大队来说，清除流毒，更需下功夫。

展览会是成功的，但这一做法并没有推广，看来仍然是“保密”的关系。

田心的民兵文艺宣传队曾参加全省民兵文艺会演，有一定的基础，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人组的歌唱活动。他们中年纪最轻的 50 多岁，而最老的已 80 左右岁。每天集中在老人间学唱歌，有时还外出参加演出；同时他们每三天在全村大扫除搞积肥。也许是这些原因，在老人组创立的 10 左右年期间，大家都身心健康，而当老人组停止活动后，当年就连续死了几人，可见这些活动对保持他们的健康是何等重要。

在田心驻点期间，我发觉田心人也很会种田，他们多次组织搬沙改土，而对于经济作物的种植更是专长，这是因地制宜。本来完全可以扬长避短，但那时为了脱掉“套种田”这顶帽，也为了“以粮为纲”，因此仍在种水稻上下功夫。

1972 年 10 月某天，我在县府大院内遇到当时的革委会政工组副组长钱耀，又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

五、老队长的担子

我和钱耀在文工团时就认识，她曾担任文教总支书记，我们称她钱大姐；她待人热情，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她的丈夫是当时军部的领导人，因此她也担任了权力很大的政工组副组长，文艺办公室是属她管的（后来，她的丈夫因上林彪的贼船，她又参与了林立果的“选美”工作而受清查）。

“老陈，要调你去文艺宣传队，”她劈头就对我说。

“我不想再干专业艺术团体了。”

“找不到合适的人，还是你行。”

“最好还是另找别的人。”

“没办法，换了几个都不行。”

“那我就试干一年看。”我踌躇之后，碍于情面，无奈何只能权宜答应。

“好吧！就一年”，她答应了。

没想到这一年却增加了四倍。也许是他们忘了？也许是我没再提出要求？也许我确是适当人选？！反正到文宣队撤销时，我又当了5年的队长。

“老 队 长”

文艺宣传队正赴沙溪公社演出，我匆匆上任，这时我已是39岁了！从26岁到文工团当团长，经历风风雨雨，现在又回到性质相同的专业艺术团体，但岁月已不饶人。

文艺宣传队的前身是成立于1965年的农村文艺宣传队，当时是学习蒙古的“乌兰牧骑”（意为红色文化工作队），全省统一组织的，每队15人，列入国家编制，从各剧团和文化馆抽人组成，由林继杰任队长。

1968年剧团撤消以后，组成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分中队和小队，因此人们习惯称为小队。1972年中队恢复潮安潮剧团的建制，小队就改称潮安县文艺宣传队。曾领导这支小队伍的有陈立弘（后任文艺办副主任）、陈鸾（后任妇联副主任，土改时曾当过我的组员）和谢明（原汉剧团指导员），我是接替谢明，他调任潮剧团团长。

我在干校时，曾在党校学习时看过文宣队的演出，并与陈立弘第一次见面。他们中有的是文工团的老部下（如林国锐、陈贤卿、王梅卿），有的则是潮剧团的老部下（如丁合生、谢楚华、陈三鹏）或原戏校的学生（如刘锐明、陈若海、杨汉荣）；还有一些是新吸收的下乡知识青年（如梁远达、胡娟、郑楚舜）。在我上任前又从下乡知青和学校中吸收几个新队员，构成了二个文

化素质、思想意识完全不同的小群体。他们都年青、有朝气，大多数人未成家，因此我理所当然成了“老队长”。

文宣队的节目小型多样，以普通话为主，而且曾参加接待全军“五七”现场会、上省会演和接待宾努亲王等，知名度很高，也经常为部队演出，因此备受军管会和支左部队的视。这些，无疑是为领导好这支队伍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文革”期间的青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毒害，无政府主义思潮比较严重，何况这批人员是经过选拔的“精英”，这也难怪大家都觉得难管。也许我还有点“余威”，也许我比较自信，毕竟我对这新、老二个小群体是熟悉的，因此“老队长”也就挑起了这个担子。

我曾和当时文宣队的作者李英群谈到以文宣队的活动为背景写一部长篇小说，因为人物既有个性，生活也丰富多彩，且不乏生动的故事情节，可惜未能如愿。

二次海南之行

我到文宣队不久，就接到通知要我们参加汕头地区春节慰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演出，主要是赴海南岛。1973年初，我们先到惠东、紫金，之后到英德茶场，再到湛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高州（九师），然后渡海，赴海南岛东线的一师和二师，历时一个月，至除夕才回潮州。

1974年春节前，我们又第二次参加省慰问团赴海南，在海口和西线五师所属各团活动。这是继潮安潮剧团之后连续二次海南之行。

在海南岛慰问演出，有几件事至今难忘：

在生产建设兵团，曾有知青来找或写信，控告有的地方拘禁人或奸污女青年，但那时我们既无法调查，也不可能把控告或信转给领导机关，因为这种事早有所闻，但谁也没有办法，只好不

了了之！

潮汕地多人少，因此据说到海南下乡就约 12 万人之多（包含插队），在下乡青年中虽不占多数，但人们发现他们在各地都形成派别、圈子，有事互相支持，而以潮阳人更多逞强、滋事，这也许是潮州人的一种习性。

二次海南归途都乘轮船，由于尚处在国门关闭时期，因此第一次经香港时，在甲板上的人都被赶到船舱下，据说是防止有人跳海逃港；第二次好些，人们聚集在甲板一侧，遥望香港那灯火如昼的夜景，不少人都以羡慕的眼光或语调注视、谈论，现在回想，颇觉可笑。

在第二次于海口市兵团司令部演出时，我们和当时中央说唱团的著名曲艺演员马季、唐杰中、赵连甲同台演出，他们 3 人演半台，而我们 30 左右人演半台，尽管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但由此也可见艺术水平的差距。

在一师慰问时，我遇到了黄家伦，他也是意溪人，曾在县中读书，兼任上下课吹号，我们叫他“号兵”。“文革”时他是文化系统的军代表，那时我是“走资派”，因此只能假装不认识。此次他热情接待我们，见面虽有点尴尬，但我也没再提及，俱往矣，何必呢！一师是我的老部队，虽已没有熟人，但毕竟有点亲切感。

当第二次回途时，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当时带队是地区文副专员，由于慰问团的成员都乘二等舱，而我们演出队却乘三等舱，对此和我们同行的田在珍很有意见。他认为演出队的人员最辛苦，却坐最差的，而慰问团的人却享受优等。为此，他和随文副专员的知青办干部吵了起来，最后还是领导让了一些二等舱照顾几个病号。从这里我看到他的长处，因为我尽管对此事有意见，但决不会像他那样率直地提出批评、论理，这种风气，此后已很少见，人们自然形成了一种上尊下卑的观念。

此事使我想起第一次赴海南回来时，在汕头港见汕头市文化部门的领导在等候迎接参加慰问的市潮剧团，我也期望回潮州后有这样的场面。那时已是除夕下午，当我们抵达宿舍时（现潮剧团），一片静寂，不见半个人影，我满腔怨气，吩咐大家把被包抬到宿舍，然后各自回家去“围炉”。我想，这时倘有某位领导在此等候，给大家慰问几句，该有多好啊！

变 革

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宣队演出的节目多数是普通话，这不足为怪。但下乡演出，农民就听不懂，为工农兵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岂不是空话？

到文宣队后，我决心要改变这个方向，尽管这在当时有点冒险，但我相信可以应付。于是，我请作者们写方言小演唱、小歌剧、小潮剧，我自己也动手改编曾庆雍的《山青竹翠》、陈邦弼的《岔路口》（改名《木棉花开》）、李英群的《石头村》；同时把陈玛原请来，继续从事方言歌的创作和探索（有些作品由周天河、杨汉荣配曲），使演出的节目农民既听得懂，又生动活泼，形成了文宣队的艺术风格。

1974年地区在潮州举行调演，我们演出方言小歌剧《山青竹翠》，虽然不是很成功，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殊不知我在戏院门口遇到当时任政工组长的某政委，他竟青着脸对我说：“谁叫你们这么搞？”我问：“怎么啦？”他不言不语就走了。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我不管，仍按我的想法坚持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步拥有一批受群众（特别是农村）喜爱的节目，如《新风赞》、《划线》、《木棉花开》、《金吊兰》等小戏和《贴心干部阿老吴》、《阿姐娶新郎》、《夸媳妇》等演唱节目。尽管这些节目从今天的角度看都有些问题，但那是当时的路线问题。